

越战时，我在南越丛林中

■ 郭道良

越战成了美国的伤口， 它让侵略者发抖

2002年1月10日，美军在阿富汗顺利取得军事胜利之际，《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加拿大著名军事评论家平可夫的文章——《美军是否战无不胜？》。文章说：今天美军在阿富汗使用的超大规模空中打击武器并非历史罕见或者首次使用。所享有的空中优势，甚至可以称作“空中绝对优势”，其实从朝鲜战争以来便无人真正挑战过。面对同样的轰炸，为什么伊拉克军队、塔利班、“基地”组织成员一听到飞机轰鸣“脚便发抖”？而志愿军和越共却让美军发抖？越战甚至成了美国的伤口，让美国侵略者发抖？

文章最后透彻地分析说：结论是军人的战斗意志完全不同。志愿军、越南军队在与美国对抗之前已经拥有了20年以上与强敌作战的经验，作战经验丰富、吃苦耐劳性强、思想意志坚定。

对于以上分析，我作为一名亲历越战的中国人深有感触。

我到越南时，美国发动的“雷鸣行动”已经进行了一年时间。根据后来的资料得知，在此后的8年时间，美国向越南投掷了800多万吨各式炸弹，相当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弹的4倍还多。可以说，在越南战场，美军使用了能够动用的所有空中优势。

开始时，美军把破坏民族解放军的根据地作为轰炸的首要目标。为此，美军在越南首次动用最先进的B-52重型轰炸机。这种轰炸机每批次出动15至30架，采用坐标控制，进行地毯式轰炸，30秒钟投掷100多枚炸弹，一平方公里内所有目标荡然



越南民族解放军战士

无存。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解放军为了减少伤亡，保存力量，主动放弃了根据地，在丛林中转战。听越南同志介绍说，有时在行军中遭遇 B-52 轰炸机，部队躲避不及，就迅速朝已经炸过的弹坑里跳，基本上造不成伤亡。因为后面的飞机从来不重复前批已炸过的目标。

美军在轰炸一个阶段后，也发现越南民族解放军没有工事，大型炸弹不能发挥作用。于是又把 B-52 投掷的炸弹改为专门对付步兵的子母弹。这种类似今天称为集束炸弹的武器，其实为一个霰弹筒，整个弹体约有 1000 磅左右，内装 200 多个小炸弹，每个小炸弹可破碎成 300 片，能覆盖一个足球场地的范围。为了对付美军的子母弹，部队宿营后，每一个人都挖一个掩体，顶部架以树干，上面加盖一尺多厚的土层。入口处，用树叶搭成一斜坡形状，如果炸弹落在掩体口就会滑向一旁，而不落入掩体中。

我到一团不久，遇到了一次美军 B-52 轰炸机的袭击。当时已经接近傍晚，部队在一片密林中

宿营。记得医生正在给我理发，忽然一阵带有金属音的轰鸣声从空中传来。我们知道是 B-52 机群来了，都警惕地听着空中的动静，一会功夫，空中突然传来“嘭！嘭！”几声巨响，正在我身边的翻译文创大喊一声：“敌机投弹了！”

大家纷纷摆下手中的事，翻身钻进旁边的掩体。几秒钟后，掩体外面像炒豆子似的，乒乒乓乓地炸开了，响声一片，分不清远近。轰炸停下来，我看了一下表，爆炸整整持续了五分钟。我们钻出掩体，头一个感觉是天空好像比原来亮了许多。抬头一看，树叶全部被炸弹的碎片打掉了，但树木却没有一颗倒掉。像是一下子到了冬天，周围的丛林光秃秃一片。在惊叹美军武器先进的同时，我切身地感受到民族解放军的勇敢和睿智。部队清点人员后，只有几个轻伤。

除用飞机轰炸外，美军还不断进行空投部队扫荡。我在一团曾多次遇到美军的袭击，有几次情况很危险。一天傍晚，部队快到达宿营地时，突然两架武装直升机低空飞来。虽然部队都躲进丛林，但敌机还是发现了情况。机舱口上架着的机枪，开始向小路两侧扫射。路上没有任何工事，无处藏身。我就找了一个一人多高的白蚁巢与敌机周旋。敌机从东边来，我就躲到西边，敌机转到西边，我就转回东边。敌机打了一阵，向远处飞去。

趁这个空档，在不远处的政委跑过来告诉我们说：“别动队可能盯上了我们，把枪顶上膛快速前进！”一时间，情况相当紧张，我也拉动枪机顶上子弹，把枪提在手里，警卫战士们都把冲锋枪顶上膛拉到胸前。

部队急速行军，到达指定的宿营地时，天已黑下来。还没等我们停稳，不远处就响起了枪声，越来越密集，不一会，枪声渐渐远去。显然，部队与别动队遭遇了。

这时，一位指挥员跑来报告说：打死几个别动队员，其余的跑掉了。政委与团长商量后，命令部队不要宿营，快速转移。我跟着部队，沿西贡河边继续向北疾行。约走了 40 分钟，部队转移到另外

一个地方停下来。这时，敌人的炮火开始向我们刚才停留的地方袭击，爆炸声非常响亮，炮弹出口声、呼啸声、爆炸声连成一片，感觉就在身边爆炸一样。我因为刚到一团不久，遇到这种情况，心情相当紧张，晚上也没有睡好。

5月10日左右，我们又遇到一次更加危险的袭击。那时我到一团已经一个多月了。由于到了雨季。从傍晚时下了大雨，一直持续到深夜，雨才稍微小了一些。我的吊床被雨水淋湿了，冰冷异常，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天刚亮，部队就出发了。因为下雨，没有敌机的干扰，四周显得很平静。由于没休息好，我的头有些疼痛，胃也很不舒服。

上午10点钟，我们正在一片林中休息。突然几架敌机飞来，在我们上空转了几圈后，开始在周围扫射，发射火箭弹。随后，又有几架武装直升机飞到上空，低空盘旋了一阵，也开始扫射。武装直升机飞得只比树梢稍高些，十分疯狂，显然，很可能是别动队发现了部队的踪迹，并报了信。

飞机飞的这么低，我本想拍摄，可背摄影机的战士躲飞机去了，没跟在身边。我很着急，向政委提出去找背机器的同志，政委怕我的行动暴露目标，没同意去。我只好取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摄照片。正在我拍摄期间，猛然间，一架直升机飞到头顶。因为耳朵里塞满了飞机轰鸣和扫射的声音，我竟未听到这架飞机的声音。等我抬起头时，已经清楚地看到在舱门的边上，坐着一名枪手，用重机枪不停地朝地面乱射，并投掷迫击炮弹。战士们都躲到树后，我赶紧举起相机想按快门，飞机被树梢挡住了。这时政委让我隐蔽，说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一会还会过来。他带领我迅速跃起，在不远处的一丛矮树林蹲下。果然，那架直升机又转回来，并朝我们原来停留的地方扫射。

部队很快就得到消息：在4架直升机的掩护下，美军空降了两支突击队。这时周围已经传来枪炮声。情况紧急，部队来不及走脱，只好立即摆开队形，抢挖工事，准备战斗。政委和其它干部也急匆匆地赶往前面指挥作战，我们拍摄组孤单单停留在原地。因为情况不明，我们不敢乱动。

飞机的轰炸扫射以及枪炮声，一直持续到天黑才稍微停下来。紧张连饭都没来得及吃一

口。趁着这个机会，我从腰间取下饭包，刚刚吃了几口米饭，一个战士就匆匆来到我们面前，转告说：政委正在前面指挥作战，他通知我们说，敌人空降很多部队，这一带已经不安全，必须尽快转移。

当时，天已漆黑，林中看不清道路。我们不能点灯照明，也辨不清方位，只好跟着战士蒙着头瞎走。林中满是树丛和败草，不断遇到倒伏的树干和各种树藤挡住去路。大约走了20多分钟后，我满以为已经走了很远。但是仔细一看，不知道怎么又转到刚才休息的地方。周围敌情不明，我们又脱离部队，因此每个人都很有着急。正在这时，政委赶回来找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他，就像见到主心骨，一直提着的心也立即落了下来。

我们跟着政委，紧走一阵追上了部队。经过一番折腾，时间已经很晚了。翻译对我说，部队接到通知，我们刚才住过的营地被敌人发现，不能去了。部队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宿营，大部队要立即去与敌人战斗。在我们周围，敌人已增至3个连，我们随机行动。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模模糊糊地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宿营。这里有挖好的防空掩体。我感到累得没一点力气了，头和脚都很疼，吊起吊床就躺下了。这时听到远处枪炮声不断，显然，部队正与敌人激战。空中不时有飞机飞过，“嗡嗡”的声音搅人心烦。

就这样半睡半醒地迷糊着，也不知过了多久，睁开眼睛时已到了早晨。把我送到营地就不见了。政委也回来了。他兴致很高地对我说，昨晚部队消灭40多个敌人，其中有3个美国人，并缴获一批武器，抓了一个伪军俘虏。

整天行军作战，多数时间情况危险，根本顾不上拍摄。所以跟随部队活动时间虽然不短，却没能拍到多少素材。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向政委提出要拍缴获的武器和美军尸体，政委这回总算同意了。

下午3点多，缴获的武器陆续送到团部。在战士们整理集中缴获的武器时，我拍摄了几个镜头。随后，又随同团里安排的侦察兵去战场拍摄。我们在树林中绕来绕去，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丛林中火药味还没有散尽，到处是残破的枝叶。侦察兵找到了被打死的美军。

按照常规说,美军当时拥有绝对优势。每次遭遇战发生后,美军都会迅速地派出大批部队,进行支援。民族解放军往往也是打了就跑,很少恋战。美军有一个重要的作战传统,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他们都要打扫战场,把尸体、伤员和其他能够运走的物品全部运走,运不走的统统都要炸毁,不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族解放军经过长期的战争,找到了对付美军这种做法的方法。他们在袭击美军得手后,在撤离之前,往往迅速地把枪支弹药以及一些美军尸体拖到附近丛林中隐藏起来。等美军打扫完战场撤走后,再返回来处理。这大概也是在越战中,为什么美军有那么多官兵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体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看到的这具美军尸体就是民族解放军在撤离前隐藏起来的。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美军士兵。他20多岁的样子,身材魁梧,头发理得很短,身上的迷彩服残破不堪,一条一块地挂在身上,无疑是受到了重创。他仰面躺在一片杂草和落叶中,紧闭双眼,睡着了一样。根据美国自己的统计,在整个越战期间,共有5万多美军官兵,就这样葬身异国他乡。

在美国决定扩大越南战争之际,驻越南美军总司令哈金斯在告别宴会上,曾有预感地引用了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诗句,朗诵给他的继任者威斯特摩兰,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忧虑: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



被击毙的美国军人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还有那阴沉的铭文:

“这里躺着一个傻瓜,他曾想夺取东方。”

事实的发展正如哈金斯担心的那样,成千上万的美军士兵怀着征服的梦想来到越南,但最终却纷纷地把本来属于阳光下的生命留在暗无天日的丛林中。相反,1975年,在丛林中坚持游击斗争20余年的民族解放军最终赢得胜利,走出丛林。

部队从美军士兵尸体旁边走过时,我拍了一组镜头。

打了就跑,游击战术使敌丧胆

民族解放军除了躲避敌人追击外,也主动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在我离开一团前夕,记得是7月20日左右,部队接到伏击美军车队的命令。根据侦察得知,美军一个运输队要从汉管往禄宁基地运送物资,部队的任务就是袭击车队,破坏敌人的行动。

午饭后,部队从宿营地轻装出发。当时下着大雨,森林里白蒙蒙一片。沿着林中小路部队冒雨行进。下午5时左右,行至一片密林,部队休息待命。天黑后,部队又沿着一条林间公路走了一段,在路边停了下来,开始挖掩体。工兵班帮我和团领导每人挖了一个较坚固的掩体。

一切安排妥当后,部队像宿营一样,一动不动。只有派出去的侦察兵沿着路边活动。

大约后半夜了,路上隐隐约约有了动静。翻译告诉我,这是敌人的侦察部队。他们经过时,战士们躲在伪装好的掩体里,一声不响。敌人的侦察部队从路上不时向可疑物开枪射击,见没有任何反击,就向前走。黎明时分,几架直升机又隆隆地飞来,边飞边朝公路两侧的丛林扫射。

这是敌人大部队来临的前兆。部队仍然一动不动地潜伏着。直升机过后,一列车队开过来,领头的是一辆装甲车,车上的机枪不停地向两旁丛林射击。部队仍不作任何反应。等到大部分车驶入我们的伏击地带。团长举起手枪,一声枪

响，掩体内的战士一跃而起，冲上公路。战士们各自为战，投手榴弹、射击，见到目标就打。一时间，公路上乱成一片。

我要冲出去拍摄，被政委制止了。我想大概是等到把敌人消灭得差不多时，就会允许我去拍摄。又过了几分钟，政委通过翻译对我说，要我跟随他冲出去，不许停留。我们跃出掩体，冲上公路。见敌人的车队乱成一片，被击毁的车爆炸燃烧，敌人往车下跳，被子弹击倒。老远就见到被击毙的敌人，还有的躲到车子底下拼命抵抗。政委不让我在公路上停留，拉住我越过公路就往对面的林中钻。这时周围的枪声响成一片，分不出敌我。部队差不多全部离开公路后，大批敌机就飞临上空，开始向公路上轮番扫射、轰炸。

部队毫不恋战，不考虑建制，战士们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大概跑出一公里后，才停下来整队、集结。随后部队兜一个大圈子，返回驻地。此时，敌机一批批地飞来，轰炸完公路又向两旁的丛林疯狂扫射轰炸，一直折腾到天黑。

经过紧张战斗，又不跑，指战员们疲劳至极，躺在吊床上听着公路上空和地面的枪炮声，放松着紧张了一昼夜的神经。我也累得喘不过气来，感到双腿酸痛。

第二天一早，部队派出一批体力较好的战士，组成侦察分队，沿途寻找伤员掩埋烈士，顺便了解敌人的损失情况。我要求跟着去采访，政委同意了。但是快要到公路时，一队直升飞机隆隆地飞来，在公路上降落，接着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显然，前头的侦察部队已经与敌人交火了。我们无法前进，在林中休息，等待战况的发展。等了一会，又下起了大雨。警卫战士劝我说：“不能拍了吧？”我觉得能来一次很不容易，因此说，只要能到达那里，下雨也拍。

正在我们焦急地等待之际，前头的侦察班撤了回来。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们刚到公路上，就遇到敌人的机群。他们立即撤退到丛林，从飞机数量和敌人的枪声判断，敌人来了不少人。情况突变，我们只好顶雨原路返回。

回来不久，前面的枪声大作，打得非常激烈，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天快黑时，敌机飞临部队的驻地，打了几梭子，又扔了一阵炸弹，我们不得不暂

时躲到掩体内。天黑以后，敌机在我们周围扔了许多照明弹，把森林照得通亮，借着亮光，敌机轮番轰炸扫射。我感到很危险，就问政委下一步怎么行动。政委说，战况不明，不能盲目行动，只能原地待命。民族解放军已经适应了严酷战争环境，只要炸弹不落到头上，就必须抓紧休息。

听了政委的话后，我和衣背着背包，蒙着雨布坐在树下。这一夜，敌人的轰炸扫射没有停止，一直折腾到次日早上。这次美军肯定被打痛了，才这样强烈地反应。下午，战况逐渐缓解下来。听侦察队的同志说，敌人遭遇伏击后，空降了两个连，搜寻我们。团里派出一个营前去围歼，因而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战斗，歼灭了许多敌人，其中还有美军。

傍晚，雨停了，我们正在休息，“老太婆”来了。被越南同志称为“老太婆”的，是一种单旋翼，飞得较慢，编号为L19的侦察机，它在我们上空转了一圈后开始广播，一个女声讲的越语，我听不懂，文创对我翻译说：“这妖声在说，你们离开家，离开亲人，来到这密林中受罪，不要听越共的话了，你们回家吧！”这是美军在搞心理战，想瓦解民族解放军。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解放军战士，多数的亲人被美伪军杀害，他们的房屋、田园被美国兵毁掉，正由于在家没法活命，才来参加解放军的，让他们回家去，他们不反感吗？他们懂得，不把美国侵略者撵出越南，人民就不得安宁。说话间，从空中飘落下来一些长方形的纸片，飞机撒传单了。纸片上有的印着美国、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韩民国的国旗，是招降通行证。战士们捡起来看看，笑一笑扔掉了。还有一些传单上印着美国某城市人们静坐反对侵越战争的照片，背面用英文写着：“仇恨这场战争的并不是你一人，宗教界、议员、在这里死去的人留下的寡妇和父母们……他们都在反对这场战争！”看到这张传单，我心中暗暗高兴。这不是在给我们的战士鼓劲儿吗？正像阮友寿主席说的，美国人民也在反对这场战争。

从广播中我们知道，美国人民群众的反战运动，是随着侵越战争的升级迅速发展起来的。1965年由黑人学生团体组织的“全国学生协调委员会”带头抵制征兵，焚烧政府颁发的征兵证，号召学生不要去越南为美国侵略头目卖命。这年10月中旬，由一些学生团体联合组成的“结束越南战争全

国协调委员会”在全国十几个城市组织了近 10 万人参加的“国际抗议日”活动，次年 3 月又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了 20 万人的第二次“国际抗议日”活动，并组织了 5 万人向华盛顿进军。示威群众将白宫团团围住，使得美国总统约翰逊不敢呆在华盛顿，跑到老家得克萨斯躲藏起来。

看来，美国人民反对越战的浪潮，已经渗透到侵越美军中了。

我顺便捡了一张反战传单，夹到日记本里留作纪念。

在跟随南方民族解放军战斗的几个月中，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武器固然是战争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先进的武器，是操作武器的人的意志、谋略、斗争艺术。意志来源于正义，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决心。越南民族解放军现在虽仍处于困境，但他们却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们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有高度的聪明才智和斗争艺术，还有广大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支持。目前，敌人仍过于强大，斗争的道路会很漫长，但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他们。

这次战斗结束后不久，8 月 4 日晚上，政委把我找去，说师里来了电报，让我回去。第二天，在几个战士的护送下，我回到了首都警卫师师部。

威斯特摩兰：“他们是人类中的蝼蚁”

8 月 11 日，师政委告诉我们：接到总政治局通知，要我们返回总政治局休整，准备到南方的金鸥角采访。金鸥角位于越南的最南部，有大片的平原和沼泽地，民族解放军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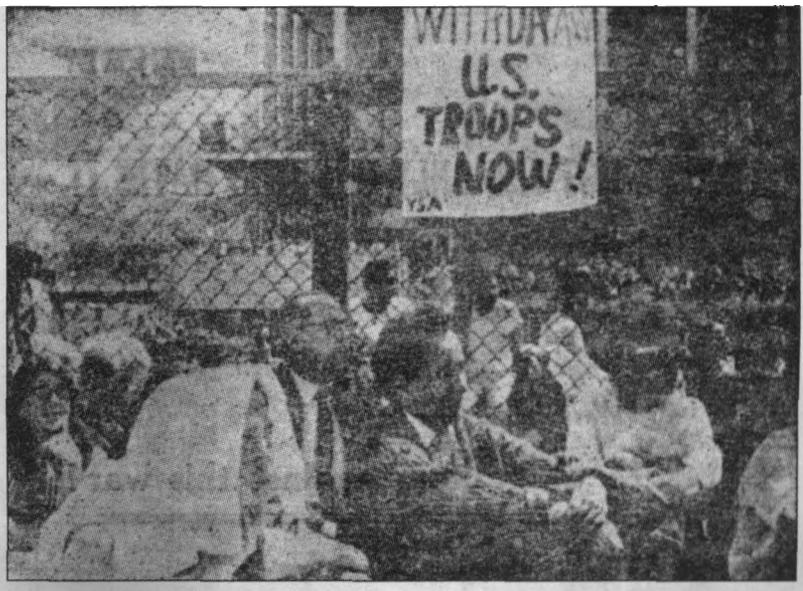
8 月 15 日，我们到了民族解放军总政治局。总政治局所在的地点相对固定，设有专门的接待站，用来接待部队和其他方面的来人。负责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们，要暂时休息一下，等另外两位同事回来后，再安排下一步活动。

在丛林中虽然活动了几个月，但因为行军打仗，情况往往很急迫和危险，因此拍摄很受限制。经过这些天的休息，体力和精神有了恢复。我们得知，这一带是

民族解放军的一个比较大的后方基地，有电影制片厂、印刷厂、总医院、广播电台等。因此，提出要去看看，总政治局给我们作了安排。为了方便我们的行动，还专门给我们搞了几辆自行车。

我们首先采访的是解放电影制片厂。制片厂建在一片高大的松树林中，厂里设有编辑部、摄影队、剪辑部和洗片部等部门，全厂 80 多人。创作人员都很年轻、绝大部分同志没有经过专业学习，边学习边工作。为了不使敌人发现，制片厂要经常搬家，每转移一次，就要盖房子，搬设备，挖防空洞和交通沟，一搞就得半年，所以大家都很辛苦。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制片厂每年都要拍摄几十部短纪录片，每次大的战役，都有纪录。晚上，我们就住在那里，看了几部他们拍摄的 16 毫米短纪录片。这些影片，有的十来分钟，有的只有三、五分钟，都是纪录一次战斗或是一次活动。影片全是黑白的，因战场条件的限制，不能冲洗彩色片。

第二天去参观了厂子下属的部门。说是部门，其实就是一些用树木临时搭建的简陋房子，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房子散布在林间。条件最好的就是洗片间。这是一座由树叶搭顶，里面包着一层铁皮的屋子。由于全部是封闭，白天也可以工作。电影厂要出影必须有电，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他们用一盏汽灯作光源，把一台破旧的宝莱克斯摄影机改成印片机印片，然后在里间的黑屋子里用手工洗片。剪辑部也是在一个棚子里。用图钉把一个个



美军空投的美国人民反战传单

电影镜头的胶片钉在木板上，用放大镜就着光亮筛选镜头，然后一个个接起来。我们来参观的时候，几位女同志正在编辑最近拍的一次战斗的短片。电影厂还举办摄影训练班。用一台缴获美国的16毫米艾姆摄影机。我参观的时候，看到在用树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老师正在讲课，下面坐着的学员记录。为了锻炼摄影师的臂力，电影厂用木头制了几台比摄影机稍大的假摄影机，平时，学员拿它练习。

随后，我们又到解放阵线文工团和总部电影队采访。我们到文工团时，正赶上他们欢送工作队下部队，举行联欢会。文工团要定期组织工作队，派往各部队。我们见到了曾在D战区碰见过的几个团员，但是没有见到阮春洪团长。听其他人说，他们已到部队去了。总部电影放映队，常年给各个部队放映电影，随部队行动，部队休息时就放电影。每次带两部至三部电影片，周转一次最少几个月时间。由于部队流动性大，他们的器材重，有时找不到部队，带的粮食吃完了，就靠打一些野生动物维持。但他们尽量跟随部队活动，通常三个人一组，每个人除了行装外，还要背几十公斤重的器材，带几公斤大米。发电机重，只有请部队的同志帮着抬。放电影通常在晚上，敌机飞来或打炮的时候，就立即疏散，等情况稳定后继续放映。因为敌人干扰，电影放放停停，常常到后半夜，有时通宵。电影放映队不仅为部队放映，如果条件许可，也给群众放映。

民族解放军的印刷厂，厂房是几间半地下的树叶棚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台印刷机。一台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完全用木材制成，非常简陋，已成为展览品了。第二台是抗法战争时期使用过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部队向北撤退，把这台印刷机藏在森林里。1962年部队回来后，又找出来，部件已残缺不全，他们用坚硬的木材制成大轴代替钢轴，从铁桥上折下钢板，制成脚蹬的架子。经过维修，这台机器运转起来，现在仍在用。第三台是中国上海生产的半自动印刷机。说起这台机器，也经历了坎坷。在运输途中遇到敌人扫荡，他们把机器拆了沉入河底，扫荡结束后又捞出。因此，这台机器从运输到安装使用，差不多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机器安装好后，厂里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很多。

印刷厂担任着南方领导机关各种文件材料的印刷任务，还出版了10多种报纸。但是因为条件限制，不能印刷彩色图片。在一间屋子里，我们看到了摆放整齐的报纸，我们拍摄了印刷厂的三台机器和工人们工作的情况。

越南民族解放军的总医院也设在这一带。说是总医院，条件也非常简陋，就是稍微固定一些，屋子通常用树枝搭建而成。几间用绿色塑料布围成的小房间，当作野战手术室。总医院的条件虽然简陋，却吸引了许多有爱国之心的人才。采访中，他们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博克西”，越语就是博士。民族解放军女副司令阮氏定，就曾在这里做过手术。她长期在 frontline 行军战斗，患了恶性疟疾。由于条件限制，打针消毒不好，整个臂部发生了感染。最后来到总医院，做手术挖掉已经腐烂的肉，治好了她的病。

总医院利用简单条件，自制一些急需的药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们从一种叫金鸡那树的树上提取物质，制成防治疟疾的药，有片剂，也有针剂。我在D战区时，医生常让我服用一种白色大药片，就是这里生产的。总医院还举办学习班，培养医务人员。我们参观的时候，看见学员在棚子里正在上课。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参观越南南方解电台。在丛林中战斗的民族解放军，生活艰苦单调，与外界联系非常有限。因此，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台小型收音机，带在身上。休息时，听收音机成了他们唯一的消遣方式。到达电台附近时，远远地就看见弹坑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随同的越南同志给我们解释说，敌人十分害怕听到我们的广播，害怕我们揭露他们的失败，因此常派飞机进行轰炸。

电台的录音棚设在一间地下掩体中，四周泥土墙壁钉着木板，用来隔音和防潮，在一张铺着灰色台布的木桌前，坐着男女两位播音员，他们正在录音。台里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正在播音的男青年，是阮友寿主席的儿子。在屋子的一侧，录音师正用一台半导体录音机录音。为了防备美军直接轰炸录音棚，录好的节目往往被拿到远离录音棚的地方播放。天线架在大树上。



缴获的一部分美国武器

美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电台的轰炸，但电台却一天也没有中断过。对民族解放军顽强的生存能力和斗争手段，美军驻越南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回忆中曾这样说：他们（民族解放军）隐蔽其设施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是人类中的鼯鼠。

正在我们等待下一步行动任务时，9月10日，总政治局同志告诉我们：中国国内来了电报，去金鸥角的计划取消，准备回国。

我们随后又转到民族解放阵线宣讯委员会。宣讯委员会相当中国的中央宣传部，是对外宣传的最高领导机关，位于越柬边境一带，属于大后方了。到达宣讯委员会后，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以及其它一些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条件非常好的住所。新的住所用塑料布围着，连顶棚也绷着塑料布。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地面上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两瓶野凤兰花，正旺盛地开着。另外一边放了一瓶人参酒，是韩国制造的。还有半打产自中国的蜂王精，两瓶蜜饯，一盘糖果。桌子上方并排挂着两个镜框，里面贴着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毛泽东和胡志明像。地下放着脸盆，上面摆着新毛巾、牙刷、牙膏、檀香皂，清一色都是中国货。这些原本在国内平常的东西，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到了。

经过半年多时间在丛林中转战，我们的身体

已十分虚弱，这时，越南方面每天派医生来，有病的开药，没病的给打一针维生素B12。全组同志会合在一块，心里踏实多了。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宣讯委员会又这么热情地照顾，真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大概是一个多星期后，我们接到越南转来的国内的电报，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国内。还指示，我们所使用的器材，除已拍摄的胶片外，全部赠送给民族解放阵线。接到指示后，我们仔细地擦拭了每台摄影机，整理好胶片，做好随时回国的准备。

在我们动身回国的前一天，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在这个难忘的时刻，除了民族解放阵线宣讯委员会的领导外，制片厂的领导和一些共同工作过的战友也来了。

仪式开始后，中越双方领导讲了话。随后，我们把带来的全部器材交给民族解放阵线制片厂。计有：35毫米西德产的阿莱弗来克斯电影摄影机一台，16毫米瑞士产的宝来克斯电影摄影机七台，英国产的威士顿测光表3块，未拍摄的彩色胶片60盒。

在仪式最后，我们还共同唱起当时歌颂中越两国友谊的歌曲：越南——中华，山连山，水连水……我们欢呼万岁，胡志明、毛泽东。当时的情景是非常感人的。

三天后，我们踏上返回祖国的路程。9月下旬，我们回到北京。这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乱了，给我们布置任务的领导已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在越南的工作情况无处汇报，至于影片的后制作，更是无人过问。

此后30多年，历史发生了沧桑巨变。我当年亲身经历的越南战争，最终以越南人民的胜利告终。在此期间，中越两国的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当年列入中越两国总理议事日程的彩色纪录片直到现在还没有问世。至于其中的故事，更是鲜有人提及。

（本文由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王永生同志整理）